

# 现代性学科建制的突破与 马克思哲学的存在方式

□ 贺 来

吉林大学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吉林 长春 130012

## 一、重建哲学与现实生活的“有机联系”

哲学与现实生活的“有机联系”意味着,哲学与现实世界之间建立起一种良性的内在循环关系。一方面,现实生活构成哲学的起点和归宿。哲学并非依靠纯粹理性而自足完备、无须外求的独立王国,其生命之根深植于不断变动、充满矛盾的现实生活之中,哲学的合法性来源于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性反思并须在现实生活中确证自己的现实力量。对此,马克思明确说道:“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无论是哲学的内容和主题,还是哲学的语言,都根源于现实生活:“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独立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另一方面,哲学又以一种理论的方式“趋向现实”,作为一种内在的思想力量参与和推进到对现实生活的运动和跃迁之中,从现实生活中生成的哲学思想需要再次回归到现实生活,“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和现实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总之,哲学虽然根植于现实生活,但其一旦形成,它便获得了相对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并不意味着脱离现实生活,而是为了以一种反思批判的方式更深入地理解现实生活的本质,从而“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在哲学与现实生活的这种良性循环中,哲学以理论的方式成为现实生活变化和发展的内在环节和有机构成力量。

对于马克思哲学与现实生活的这种内在循环关系的理解,柯尔施曾用“理论与实践的整体性”来进行概括,他认为,对马克思哲学而言,“理论上的批判和实践上的推翻在这里是不可分离的活动,这不是在任何抽象的意义上说的,而是具体地和现实地

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和现实的世界”。在二者的这种不可分离的辩证关系中,马克思超越了片面的“实践政治派”,他们不懂得:“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消灭哲学”,同时也超越了片面的“理论政治派”,他们不懂得:“不消灭哲学,就能够使哲学成为现实”。在此,哲学与现实生活不再是一种外在的强制性关系,而真正成为一种内在融涵、彼此滋养、相互推进的有机关系。很显然,马克思哲学与现实生活所建立的这种“有机联系”,与现代性学科建制中的“学院哲学”有着重大不同的思想旨趣,也必然会带来哲学存在方式、工作方式等多方面的重大变化。

## 二、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前提性追问: 为未来“开路”的批判性思想

对社会生活的前提性追问,包含两个基本视角,一是追问构成社会生活本质的社会关系的合法性;二是追问人们理解这种关系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追问构成社会生活本质的社会关系的合法性,基于马克思对于社会关系在人的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本质性作用的认识。在马克思看来,人在根本上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社会关系对于人的存在具有根本的“本体性”的意义,他强调:“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意味着,现实的个人都不是遗世独立的孤立存在,而是生活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生存品性乃至生存命运都受到各自所处的社会关系的深刻影响,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规定了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生活前景,因此,一个人在自由与解放程度与其社会关系的合乎人性的程度内在地关联在一起。基于这一基本认识,反思现实世界中社会关系的性质,揭示其与人的自由和发展相矛盾的内在困境,从而使人们获得对于社会历史现实本质的自觉意识,从而使自身成为内在于“实际的改变与变革现存事物”的实践活动

的推动力量,就成为哲学的重要功能。

追问构成社会生活本质的社会关系的合法性,对马克思而言,集中体现在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合法性的前提性追问。众所周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从商品开始的,在此,笔者引用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中的一段话说明这一点:“商品形式的秘密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人与人自由的社会联系被抽象的物与物关系所笼罩和扭曲,抽象对人的统治成为现代人的命运。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商品、资本等资本主义社会的“象形文字”的解码,揭示了社会关系的“自反性”与存在限度,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合法性危机,结束了其把自身永恒化的“终结历史”的幻想。

追问人们理解社会现实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是对一定历史条件下占据统治地位的、支配着人们对社会现实理解和认识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的批判性反思。这即是马克思哲学极为重要的“意识形态批判”功能。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的认识和观念却总有一种僭越自身界限,把自身变成独立王国,并由此颠倒观念与生活关系,产生观念支配世界的幻觉。对此,马克思论述道:“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联系。他们头脑的产物就统治他们。他们这些统治者就屈从于自己的造物。我们要把他们从幻想、观念、教条和想象的存在物中解放出来,使他们不再在这些东西的枷锁下呻吟喘息。我们要起来反抗这种思想的统治”。抽象观念成为“意识形态”,具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为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二是进一步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显然,以这种抽象观念为根据来理解现实生活,必然扭曲对现实生活本质的理解,更严重的是,它将成为一种使现存状况永恒化、阻止其变革与发展的僵化和保守力量。因此,揭示了抽象观念成为“意识形态”的深层根源,揭穿其独立性外观和普遍性形式的假象的秘密,是“实际地改变与变革现存事物”

的重要条件。

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具体思想展开进行讨论。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要破除意识形态的幻象,关键在于确立这样的历史观。

### 三、在“跨学科”的批判性对话中 拓展哲学的思想空间

把哲学把握为对社会生活合法性的前提追问活动,使马克思哲学跨越了以往哲学的存在边界。这突出地体现在它通过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批判性对话,拓展哲学的思想空间,重塑了哲学的存在方式、工作方式,乃至表述方式。

在其本源处,哲学就是与人类文化的其他学科和知识领域相互作用的,但随着哲学成为“后设叙事”与“超级学科”,哲学成为高居于其他学科和知识领域的、“唯我独尊”的“孤家寡人”,当哲学把这视为“王者荣耀”时,其实正是哲学的不幸,它把自身封闭在一个自我旋转的圆圈中志得意满,其他具体学科却不断离它远去,在独立发展中不断深化和丰富属于自己的领域和王国,与此同时,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哲学被从“自然和历史领域驱逐出去”,失去了它应有的思想宽度和包容性。

把哲学视为“后设叙事”与“超级学科”,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信念:它比所有其他学科都更深入地接触到了“实在”本身。人类文化的各具体学科和领域认识世界的不同方面,但哲学所面对的不是世界的某种特殊的部分,而是世界的“本质”或“实在本身”。因此,在哲学与人类文化的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前者扮演着法官和审判者的地位,后者则处于从属和依附的地位,以这种信念为前提,哲学与人类文化的其他学科之间不可能也不需要真正的批判性对话。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副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深层的批判性对话,是马克思哲学,尤其是其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重大奥秘。马克思自己承认:“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学中去寻求”,正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透彻研究,使马克思深入到了现实社会生活本质的深处。但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又不是简单地把它当作现成的东西接受下来,而是始终把它与前述的社会现实生活的前提性追问内在结合在一起,马克思追问现实社会生活的社会关系本质合法性、追问人们理解社会现实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同时也就意味着追

问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合法性限度。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私有财产及其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不予反思的无条件的前提，正是这一点，构成古典政治经济学无法突破的根本限度。通过对这一根本限度的批判性反思，马克思形成了他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诊断、治疗与超越，马克思哲学独有的理论纲领和思想硬核也因此得以酝酿成熟。对此，马尔库塞的说法是颇富有见地的，他认为：“马克思理论的所有哲学概念都是社会的和经济的范畴，然而，黑格尔的社会和经济范畴都是哲学的概念……在马克思理论中，任何一个简单概念都有一个本质不同的基础。这正像一个新的理论必有一个不能从先前的理论中所产生的新的概念结构和总体结构一样”。

同样十分重要的是马克思晚年卷帙浩繁的《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对于这些耗费巨大精力所做的研究工作，如果囿于传统哲学的观念，在这里几乎找不到“哲学”。然而，如果我们不再坚持作为“后设叙事”与“超级学科”的哲学自我理解，就可以看到，马克思通过与英、美、德、俄重要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批判性对话，充分吸收其思想资源，重新反思、调整、丰富和完善自己以往的思想观点和理论表述，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视野，对已经形成的哲学思想进行自我前提性的批判。正是在此意义上，人们普遍承认，他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构成其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为后来者从变化了的历史境遇出发不断重思理论与现实开辟了一个开放的思想空间。甚至有学者不无根据地主张，人类学是人们熟知的马克思哲学“三大来源”之外的第四大来源和组成部分。

马克思与文学的关系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我们可以发现，从青年马克思到晚年马克思，文学始终是其把握时代本质、激发理论思考、表述理论观点的重要资源。马克思从荷马史诗、希腊悲剧中获得了解古代社会的重要资源在讨论货币时，马克思大段引用莎士比亚的描述，声称对于货币本质，莎士比亚比“我们那些满口理论的小资产阶级知道得更清楚”，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钟情 18—19 世纪文学作品，马克思称赞巴尔扎克对资本主义的“现实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恩格斯认为《人间喜剧》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那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的职业史学家、经济学家

和统计学家们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都要多”。柏拉威尔在《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一书中十分细致地梳理、研究和探讨了文学在马克思毕生理论探索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指出，从马克思青年时代开始，“文学成了他有力的战斗武器；随着他自己的世界观逐渐从早期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混合物中演变出来，他就开始借助文学来证实和提出他的新观点；他认为，在文学或其他艺术中不取得一个牢固的杰出的地位，他在成熟时期要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是不可能的；晚年的马克思则经常从文学作品中寻找精神上的支持、游戏的材料、论点的弹药。他精通古典文学，从中世纪到歌德时代的德国文学，但丁、波雅多、塔索、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的作品，18 和 19 世纪的法国和英国的散文小说；任何当代诗歌，凡是能够有助于破坏传统权威和引起对未来社会正义的希望，……他都无不感兴趣”。马克思一改柏拉图主义“把诗人赶出理想国”的对文学的傲慢，把文学当成滋养和推动其哲学思考的重要源泉。

马克思哲学与人类文化其他学科和知识领域的这种批判性对话，不是外在的、形式性的关系，而是意味着对哲学自身及其存在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全新理解。要言之，首先，它与前述重建哲学与现实生活的有机联系、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前提性追问的哲学旨趣是内在统一的，人文社会科学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社会生活的自我理解学说，哲学重建与现实生活的有机联系，对现实社会生活进行前提性追问，必然内在要求自身与人文社会科学结盟。其次，它体现了马克思哲学超越现代性所造成的学科藩篱，扩展哲学的思想幅度，重焕哲学的思想活力的努力。在与人文社会科学不同知识领域的批判性对话中，哲学不再是唯我独尊的孤独弃妇，而是加入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和国”中，使二者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沟通关系，哲学由此有力地摆脱了现代性所形成的学科界限，获得了更为宽广的思想天地。罗蒂主张在“后哲学文化”中，哲学应成为“骑着文学的——历史的——人类的——政治的旋转木马”的文化对话者，马克思当然与此有着重大不同，但在超越“哲学文化”中哲学自我理解的幻觉，推动哲学摆脱理论自闭这一基本立场上，马克思无愧于这一趋向的先行者。最后，在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批判性对话中，哲学释放了齐泽克、柄谷行人等人说的“视差之见”所内含的批判潜能，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与人类学的批判性对话，实质上是马克思在思想视界的“移动”中不断消除“思想盲点”，对对方和自身思想前提进行反思和修正的过程，因此，这种批判性对话，是哲学获得思想活力和创造力的重要途径。

■ 《天津社会科学》2017 年第 6 期，约 13000 字